

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

霍克思《红楼梦》

翻译评论五讲

尹衍桐 付晓——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
霍克思《红楼梦》
翻译评论五讲

尹衍桐 付 晓——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 霍克思《红楼梦》翻译评论
五讲 / 尹衍桐, 付晓编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104-04890-9

I. ①诗… II. ①尹…②付… III. ①《红楼梦》—
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3781号

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 霍克思《红楼梦》翻译评论五讲

特约编辑: 齐 钰 赵成伟
责任编辑: 王松林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邮 编: 100055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 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印 刷: 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9年10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890-9

定 价: 68.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8CX05028B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绪 论	(001)
-----------	-------

| 对话篇 作者、译者、读者 |

引 言	(008)
第一章 译者作为诠释者和英文版本的修订者	(011)
第二章 隐含作者的情感 and 价值倾向	(016)
第三章 叙述者的声音	(021)
第四章 让读者透彻地理解	(030)
结 语	(038)

| 地道篇 从句子到语篇 |

引 言	(040)
第一章 句法自然	(043)
第二章 深表层结构转换	(049)
第三章 语篇翻译与译者的“写作”	(053)
第四章 文体的规范	(060)
结 语	(066)

| 视角篇 形式和转变 |

引 言	(068)
第一章 人物视角的形式特征	(069)

第二章	传译人物的“眼光”	(079)
第三章	视角的流动和转换	(083)
结 语		(090)

| 转述语篇 形式、风格和类型 |

引 言		(092)
第一章	转述语的表层形式	(093)
第二章	转述语的话语风格	(099)
第三章	特殊转述语类型及其翻译	(104)
第四章	不同引语方式的相互转换	(115)
结 语		(119)

| 诗化篇 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 |

引 言		(122)
第一章	信手拈来 匠心独运	(124)
第二章	叙述话语的“味外味”	(132)
第三章	《红楼梦》的语型修辞	(139)
第四章	形神兼备 惟妙惟肖	(144)
第五章	化景为境 境以诗传	(158)
结 语		(164)

本书参考文献		(167)
--------	-------	-------

附 录		(171)
-----	-------	-------

■ 绪 论

这本书是关于翻译家大卫·霍克思所译《红楼梦》的评论。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翻译《红楼梦》会面临语言、文学、文化等种种问题，但这也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种种选题。早在1993年，李绍年在《语言与翻译》杂志发表的《〈红楼梦〉翻译学刍议》一文中就指出，对《红楼梦》翻译的系统研究便会形成“《红楼梦》翻译学”。刘士聪教授在为王宏印教授的著作《〈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2001：4）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在我国，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已有较悠远的历史和较丰厚的成果，其人与日俱增，其势与日俱劲。作为世界文学瑰宝的《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翻译界也应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相信将来能有更多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出现，使其形成与“红学”相媲美的一门学问——“《红楼》译学”。希望这一局面，尽快到来。

乔福锦在《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2008）一文中把《红楼梦》的“翻译与比较研究”作为现代学术视野中红学学科构架的八大主题之一。

目前，《红楼梦》翻译研究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涉及翻译史、语言、文学、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此外，近年来出现了运用语料库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除了散见于诸如《红楼梦学刊》等学术期刊的论文外，先后还有几本《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文集和专著问世。其中有聚焦于某一话题的专门研究。例如，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1976）、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1993），介绍了英译本在英美和新加坡等英语地区的情况。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2014）对《红楼梦》在英语世界170年的历程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系统研究。冯庆华主编的《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2006）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的深入剖析，对《红楼梦》中几

乎所有主要语言因素展开研究，包括场景描写、各种诗体、各种修辞方法及修辞格、各类习语、中国文化的特殊成分。该书作者对原语和译文进行了仔细对照与点评。其他还有诸如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2001）、肖家燕《〈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2009）、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2012）、王丹阳《〈红楼梦〉翻译的诗学新解》（2014）、冯庆华《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红楼梦〉英译译本研究》（2015）、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2016）等。也有内容涉及《红楼梦》翻译方方面面的会议文集和专辑。例如，刘士聪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2004），收录了2002年10月在天津举办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论文，内容涉及总体与策略研究，语言与语篇，文学与修辞，文化倾向性，德语、俄语译本的翻译研究等。2011年《红楼梦》译介学国际研讨会专辑，即《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期，其研讨会于2011年10月在四川西南交通大学召开。根据该研讨会综述，大会发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文献资料出发，对《红楼梦》多种译本在海外传播历史及现状的梳理和评述；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在宏观的文化差异层面，就思想观念、语言特点探讨《红楼梦》的翻译和海外传播；三是以文本研究为基点，在语言层面，就习语、修辞、句法及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问题探讨《红楼梦》各译本的翻译情况。

一、本书的思路

本书名为《诗化小说的诗化翻译》，但并不对《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的译本进行评价。

汪道伦先生评价《红楼梦》时说：

《红楼梦》这部举世闻名的小说，虽不能说成“小说诗”，以免有借诗以增身价之嫌，但把它说成小说中有诗，这大概不算过分吧。小说中的诗，当然不是指《葬花词》《芙蓉诔》之类的名诗，而是说《红楼梦》的叙事、写景、抒情、刻画人物，在不少地方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以诗的笔触来写小说。（1999：218）

周汝昌先生评价《红楼梦》时也说：

读《红楼梦》，当然是“看小说”，但实际更是赏诗。没有诗的眼光与“心

光”，是读不了的。所谓诗，不是指那显眼的形式，平平仄仄，五言七言……更不指结社、联句、论诗……场面。是指全书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诗的，所现之情与境也是诗的。我这儿用“诗”是来代表中华文化艺术的一个总的脉络与精髓。勉强为之名，叫做‘境界’。(1995：87)

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称呼：以诗心察物，以诗笔画人，以诗境传神，以诗情写照。一句话：他能把一切要叙写的对象都加以“诗化”。这才是雪芹的第一等难以企及的艺术奇能，文章绝擅。(1995：107—108)

因此，本书主要以叙事为主，探讨叙事中的诗化和诗化的翻译，一方面考察翻译者如何处理小说中的诗化话语，另一方面考察翻译者使用的诗化翻译手段。从《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现状来看，从叙事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既令人感到不解，也令人感到遗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叙事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本身兴起较晚，引入国内更晚；另一方面，与以往译论主要关注字词句层面的翻译转换技巧和直译/意译的方法有关。此外，有关中国古典叙事的研究一般更多关注结构、情节、时空关系等宏观话题，往往被认为与翻译转换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翻译主要是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

叙事是探讨《红楼梦》翻译的主要维度。首先，叙事性是小说的本质特征，如何抓住这一特征，并在译文中体现这一特征，才是小说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吴克礼，见郑敏宇，2007：序）。徐岱这样描述叙事之于小说的重要性：

使小说学时来运转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叙述学的勃兴。因为人们看到，叙事之于小说犹如旋律节奏之于音乐、造型之于雕塑、姿态之于舞蹈、色彩线条之于绘画，以及意象之于诗歌，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形态学规定。(2010：5)

其次，叙事学和翻译研究各自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有交合点和共同点。譬如，二者都要面对内容和形式的划分，叙事学有作品“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翻译研究有“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叙事学所揭示的有关作品自身的叙事规律、叙事风格和修辞效果，是任何小说翻译者首先要关注的内容，也为翻译转换提供了理论基础。叙事学所探讨的小说作者、叙事者以及人物的关系、叙事视角、叙述语、转述语类型和叙事修辞等都是小说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

具体到《红楼梦》来说，关注其叙事法则才能确保在翻译中传达其艺术价值和审

美价值。作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体现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鲜明的叙事特色,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技巧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无论是翻译还是翻译批评,都不能忽视这些特色而满足于停留在字词句的转换层面。

王平(2001:3)在谈到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只有以叙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理论才是最符合小说文体特征的批评理论。这句话显然也适用于小说翻译批评。叙事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红楼梦》作品世界里的叙事结构与体系,分析其叙事法则、技巧和规律,揭示《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奥秘,为《红楼梦》的翻译和翻译批评提供理论指导。

在聚焦小说叙事的同时,我们显然不能回避语言、文体、风格、修辞等因素,这些因素融合于小说的叙事中。一方面,“在小说叙事活动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一种修辞关系。这是小说作为艺术的审美规定性的表现,因而从艺术上透视小说的叙事法则,同样不能疏漏了对其修辞品格作出分析”(徐岱,2010:331)。另一方面,文体学与叙事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不相同。文体学家认为,语言特征才是作品的艺术性之所在,而叙述学家则偏重于叙事技巧。如果我们在研究小说翻译时,既关心小说文本对故事的巧妙安排,即叙事节奏,也关心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即文字本身的韵律,将这两方面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那么这样对小说翻译的研究将是较为全面的(郑敏宇,2007:16)。

我们知道,一部叙事作品是由作者、叙事者、故事、叙事话语、叙事方式、叙事接受者等几个部分组成的。这些因素都是小说译者不能忽视的因素,但并非所有与这些因素相关的层面都与翻译转换直接相关。正如郑敏宇等所指出的,在小说翻译过程中,与翻译直接相关的是叙事的话语层而非故事层。基于此,本书将重点探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叙事主体和翻译主体层面,特别是译者、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和各自的角色;

二是叙事话语的层面,包括叙述语、转述语、叙述视角翻译转换的问题等;

三是叙事方式的方面,包括叙事修辞翻译转换中的问题。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五讲:

第一讲是对话篇,探讨翻译中译者、作者、读者的关系,涉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隐含作者的意图、叙述者的声音以及读者因素等。

第二讲是地道篇，考察译文的自然和规范问题，包括句法自然、深表层结构的转换、语篇“写作”和文体规范等方面。

第三讲是视角篇，分析小说视角相关的翻译问题。不同的叙述视角体现不同的审美意图，翻译中既要考虑视角的表层形式，也要考虑叙述者视角和人物视角的切换、视角的流动、不同视角类型的转换等。

第四讲是转述语篇，分析《红楼梦》中人物话语的翻译问题，不仅涉及形式问题，人物语言的风格、修辞等问题，也涉及特殊转述语类型以及不同引语类型的转换。

第五讲是诗化篇，专注于《红楼梦》的诗化特征，选取了词语的诗化特征、叙事话语的“味外味”、语型修辞、意象和意境的创造等。

作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的叙事法则既具有代表性，又与西方小说的叙事法则有同有异。借助叙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红楼梦》翻译的问题是《红楼梦》翻译研究的重要选题，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乃至小说翻译来说同样具有代表性意义。在这方面，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以及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借鉴。同时，本书也将运用语言学、文体学、小说修辞学、话语分析等理论和方法。

二、版本选择

《红楼梦》的英译本，据陈宏薇和江帆（2004：45—63）统计，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其中，全译本有两种，一是大卫·霍克思和约翰·闵福德（David Hawkes & John Minford）译本，英文书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者是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霍克思译前八十回，闵福德译后四十回；一是杨宪益和戴乃选译本，英文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译者是中国著名翻译家。

本书主要评价霍克思所译八十回，在必要处与杨宪益和戴乃选译本作比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和《红楼梦》的研究者一样，译者也不得不面对版本的选择问题。《红楼梦》存在着多种版本，而且各种版本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版本可分为两大类：以早期手抄本为基础的八十回版本与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基础的版本。霍克思选择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为原文，间或参阅八十回手抄本的文字以弥补损失。他

在序言中表明：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发觉不能严格忠于某种单一版本。因为程高本更为前后一致，所以，虽然它没有其余版本有趣，我在第一章还是主要依从这一版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经常参阅手抄本。我还修订了少数细节。（1973：1）杨、戴译本和霍克思的选择不同，译者在译本出版说明中说：我们的译本，前八十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石印本，是乾隆年间左右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是乾隆年间寂寥生保存下来的一种抄本；后四十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校勘重印的1792年一百二十回活字印刷本。寂寥生保留的前八十回手抄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之一。在翻译中，我们参照其他版本，修订了抄本中的错误。（1978：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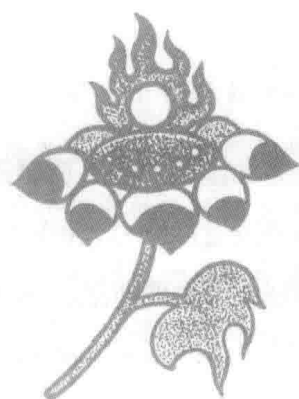
本书虽然专注于评论霍克思的翻译艺术，但是，我们也将所选译例的杨、戴译文附在书后，以方便读者比较和学习。所选《红楼梦》原文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版本为本，霍克思译文以 *Penguin Books*（1973）为本，所选杨、戴译本的译例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1978）为本。

三、说明及致谢

本书是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大部分译例在“文学翻译”“典籍翻译与欣赏”等课程中作为批评赏析案例使用，也指导学生以《红楼梦》及其翻译的相关内容做过毕业设计选题，如修辞、风格、文化、诗性特征以及翻译方法等，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8CX05028B）。本书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思维差异影响学生翻译转换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1CWZZ13）的部分成果。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与同事和学生的课内外讨论，在出版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学校、学院及同事和朋友的支持和关注，出版社的编辑也做了很多细致艰辛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对话篇

作者、译者、读者

■ 引 言

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关系是翻译研究中复杂而众说纷纭的核心问题。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说过：“一旦翻译的语用因素被接受，一旦厘清了作者/译者/读者间的关系，有关翻译作为次要活动的迷雾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地位低下的联想都会破除。”（The myth of translation as a secondary activity with all the associations of lower status implied in that assessment, can be dispelled once the extent of the pragmatic element of translation is accepted, and o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 translator/ reader is outlined.）（Bassnett, 1980: 43）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三者各自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我们知道，在作者中心论范式的传统译论中，原文作者的主体性被神圣化，作者是解释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翻译的任务就是找到作者的这个意义并予以重建，译者因此必须忠实于作者，忠实于原文，而译者的角色，正如常乃慰在《译文的风格》中所批评的，是“媒婆”：

一般的意见，翻译只能算是在原作与读者中间尽一份介绍的微力。因之，读者也认为假使他能从译品有所领悟与兴发，一切荣誉与感恩都当归之于原作者；而译者列名于作品也只像是介绍人列名于结婚启事，其责任仅限于促成男女双方的结合，在请用茶点之后便应该欣然引退，至于这一双新夫妇婚后生涯之为恩为怨，他都要抱着事不干己的态度了。可是我以为假使我们肯用心想想，这一种看法是很错误的。一部作品的翻译，绝不仅仅限于介绍原作，而有远过于此的文学价值。（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366—371）

这段话中所批评的观点被认为体现了译者和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遭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反驳和挑战。特别是在读者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下，原作者的权威地位被剥夺，甚至认为“作者死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翻译

理论甚至颠覆了传统的译者/作者关系，突出译者的主体性，给予译者很大的“自由”。

国内一些学者，如杨恒达（2000）等，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探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对解构主义等给予译者过度自由和权威的观点，强调以文本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译者的真诚性与良心。杨恒达指出：

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要看译者是否真诚，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2000：97—106）

虽然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改变了译者作为“奴仆”和“媒婆”的角色，但译者依然被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

大卫·霍克思所译《红楼梦》则给我们展示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另外一种关系。《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大卫·霍克思是曹雪芹在英语世界中的“选定作者（his chosen writer）”。他写道：

那种情感愧喜交加，寸寸柔情无不跃然纸上。这是心的诉说，是曹雪芹在诉说，是霍克斯^①在诉说。就像曹雪芹在绵绵细雨中经过了威尔士山地漫长的跋涉后，坐在牧民家里，正在啜饮一杯热乎乎的威士忌；又像是霍克斯在豪饮的醉意中修诗一夜后，坐在北京城外曹雪芹的茅舍细细品味一碗热粥。两者皆是，两者又难以分辨。实在令人汗颜。（转引自任东升，见刘士聪，2004：206）

这样的评价揭示了译者和作者之间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霍克思在其译本前言中写道：

My one guiding principle has been to translate everything—even puns. For although this is, in the sense I have already indicated, an unfinished novel, it was written (and

^①引文原文为“霍克斯”，故保留不做修改。正文仍沿用“霍克思”。

rewritten) by a great artist with his very lifeblood. I have therefore assumed that whatever I find in it is there for a purpose and must be dealt with somehow or other. I cannot pretend always to have done so successfully, but if I can convey to the reader even a fraction of the pleasure this Chinese novel has given me, I shall not have lived in vain. (1973: 46)

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翻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正如我曾指出过的，因为原书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却是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用心血精心创作并反复雕琢而成的。因此，我认为凡是书里存在的，都有他的意图，所以总要设法表达出来。我不敢妄称所有地方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能让读者体验到哪怕只是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所获乐趣的一小部分，我也就不虚此生了。（范圣宇译）

霍克思认为，《红楼梦》原作是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倾其心血写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原文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一个目的，必须认真对待。因此，他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包括“双关”。他要把自己从读原作中得到的快乐传达给读者。一方面，他以对原作者和原作近乎虔诚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译法重建作者原意；另一方面，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艺术创造力，为英美读者奉献了一部“出类拔萃，在英美文学翻译界堪称一绝”（李克兴，见杨自俭，2002：147）的经典作品。

第一章 译者作为诠释者和英文版本的修订者

通常情况下，翻译要求译者对作者个人的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要透过有关该作者的“史料”去理解作者，以便在翻译中重建作者原意。然而，《红楼梦》的译者则首先需要面对这样的困境：原作者是谁？哪个版本是原文定本？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得到明确的、静态的答案。程甲本《红楼梦》中，程伟元和高鹗的序言都说明了这一现实问题。

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序言：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金，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妄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及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全书始自是告成。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转引自吴伟凡，2012：93）

程甲本《红楼梦》高鹗序言：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同上：94）